

自由



FREE TALKING FREE TALKING

交谈 · 6 ·

张志林 吴重庆 主编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四川人民出版社



版策划.....金平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周靖明 江嘉琳

自由交谈



FREE TALKING FREE TALKING

ISBN 7-5411-1825-7



9 787541 118258

ISBN 7-5411-1825-7/I·1585

定价: 10.00元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主 编 的 话

个人自由是社会健全的根本标志。一个健全的社会必有自由交谈的广阔空间。

本丛刊力显独立思索和真诚言说的风貌——这里没有学科之限，也无文体之拘，惟有深切的感受和无畏的探究；这里没有学术权威，也无思潮明星，惟有真知的追求者和社会的批评家。

栏目之设，皆依文稿。出版日期，随缘而定。敬请有识之士踊跃投稿。我们特别欢迎问题意识鲜明、思想交锋坦诚、论说方式独特的作品。

目 录

主编的话

1999 独白

- 那个漫长而又难忘的秋天… 贾泽林 (2)
读“衰落”…………… 张志扬 (11)
存在就是做事…………… 赵汀阳 (20)

世纪漂泊

我们仍在仰望星空

——世纪之交的回望

…………… 何清涟 李 辉 (28)

旧话重提

- 是谁烧了圆明园…………… 刘克敌 (80)
陈独秀与北大派…………… 胡小松 (84)

鲁迅以什么成其伟大…… 摩 罗 (90)

治学心旅

1998, 自由主义的言说
…………… 朱学勤 (96)

太平天国不太平
——与太平天国结缘七十年
的心路历程…… 史 式 (109)

生活中的经济学

饥饿的政治…………… 韩少功 (145)

谁家的“自由市场”? …… 韩少功 (148)

人们为什么说谎?

——说谎的经济学分析

…………… 张立洪 陈友芳 (151)

从信息经济学看教授评审制

…………… 陈友芳 张立洪 (160)

民间观察

道德评价域：低限与高限

..... 周炽成 (169)

“卜杯”过程的神人关系

..... 吴重庆 (174)

秋雨心态：批评含义的误读

..... 文 成 (182)

元元·说说·看看..... 学 人 (190)

莱卡神话的解码

——广告与乌托邦..... 周 颖 (199)

1999 独白

66
· 独白 ·

特约编者按：《1999 独白》卷一、卷二已经问世，预计卷三、卷四、卷五，也将在 1999 年至 2000 年陆续出版。宗旨始终如一：“打捞思想，立此存照”，而形式依然是“独白”中的区分和互补。我们并不奢望完整——对每一个人和他经历的时代，我们只希望有自己的问题和真实的关切：他付出了，他获得了，他表达了。

《自由交谈》陆续选载《1999 独白》中的部分文稿。世纪之交能读到文化人心灵的畅想与告白，实在不易。我们愿与读者共遐想。

萌 萌

1999 年 7 月 9 日

那个漫长而又难忘的秋天

·贾泽林·

自
由
交
谈

虽说我们大家都生活在“二十世纪”，但我们通常并不感到自己与它有什么“特殊的联系”。因为我们并没有创造过什么影响了“二十世纪”历史进程的伟业。我们并不是什么世纪性的人物。今天活着的多数人都没能赶上迎接“二十世纪”的到来，因而无法知道那些曾经赶上者的心情是什么？我们或许能赶上“送别”“二十世纪”和“迎接”“二十一世纪”的时刻。然而，两个世纪交替的那一刻于我们也许与所有的今明交替时刻并没有什么不同。就我来说，我本没有感到自己与“二十世纪”之作为一个“世纪”有什么联系。可是，当我被邀请写这篇东西时，我突然感到我好像与“二十世纪”真的有某种“特殊的联系”。细细琢磨之后，才知我的这种感觉全起因于我所研究的对象——“苏联”和“苏联哲学”。而且我感到“二十世纪”似乎在1989年最后三个月——十、十一、十二月里就已经结束了。

1989年的最后三个月，我是在欧洲度过的。

历史有时好像故意要把一些重大的、意味深长的事件凝聚在一起，让它们在短短的几天或几个月中集中爆发出来（即所谓“一天等于二十年”），以便给当世的人们留下永世难忘的印象。1989年的那最后三个月，苏联和东欧诸国正在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具“转折意义”的动荡和变化。想不到那时的我竟然就置身在这些历史事件发生的“漩涡”地带。

三个月之后，1990年元旦，我才回到北京。在归国的路上，当火车在万里冰封的欧亚莽原上急驰时，我虽思绪万端，却理不出头绪，那时我惟一能清晰地意识到的只有一点：在这一年里我度过了自己一生中最为漫长的一个秋天——从北京的秋到莫斯科的秋，再到基辅的秋、瑞士弗莱堡的秋、意大利罗马的秋。我却完全没有意识到：那个秋天竟成了苏联和东欧历史命运的“象征”。而车窗外那个对俄罗斯来说最具代表性的季节——“俄罗斯之冬”，竟成了以1917年十月革命为起点、以1991年十二月苏联解体为终点的那个被称之为创造了“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国家结束的“象征”。

1989年十月初，我告别仲秋的北京，踏上去莫斯科的旅途，心情既兴奋又充满淡淡的忧伤。三十年后，才第一次有机会重来造访这个令人梦魂萦绕的国家。车窗外闪过的是绵亘千万里的白桦和火一般燃烧着的红叶。俄罗斯正在度过它巨变前“纷乱多事”的深秋。俄罗斯大自然的壮美与俄罗斯人阴郁的面部表情，形成鲜明对照。鲜有的几个明丽的日子驱散不了败叶和绵绵秋

雨带给人的惆怅。怀着崇敬的心情，“朝拜”了列宁山上的我的“大学”。可就连它也失掉了昔日的辉煌和朝气。在一个细雨纷飞的上午，来到所有留苏学生无人不晓的“斯特劳门卡宿舍”（戈尔巴乔夫与赖莎就是在这里结婚的），坐在湿漉漉的长椅上，望着那杳无人迹、长久荒芜的庭院，不禁为逝去的青春年华而失声痛哭。1957年有人曾把我们这些莘莘学子比喻为“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而今，三十年后，他们和他们的苏联同学都在哪里，命运如何？！

衰败和破旧竟然成了莫斯科留给我的最主要印象。

十月中旬，去了乌克兰的历史名城——基辅。这是我第一次拜访这座南方城市。那里正值一派金秋景象，到处都是黄叶和红叶。教堂的尖顶和圆顶在蓝天白云的衬景中闪着金色的光芒——宗教正在这里复兴，而无神论则正在失掉它曾经拥有的光华。讲乌克兰语成了时尚，乌克兰民族主义已经毫不掩饰地显现出来。一切一切都表明这个共和国即将对苏联说“不”，脱离那个“大家庭”的日子指日可待。

十月末我来到了秋色浓重的瑞士。十一月中旬在罗马度过了难忘的五天。南国意大利秋天之明丽和灿烂可以说是地球上罕见的。东欧诸国“风雨飘摇”、“瞬息万变”的局势，那时成了西欧电视报道的热点。东德人绕经匈牙利涌向西德，捷克斯洛伐克的游行示威此起彼伏，罗马尼亚的政治局势“一触即发”，波兰的经济形势“江河日下”，等等，电视对所有这些做了逐日甚至逐时逐刻的报道，渲染了“巨变在即”的气氛。

我决定把莫斯科—苏黎士往返机票改为从陆上返回莫斯科的火车票，为的是尽可能更切近地观察发生在欧洲的这场历史性巨变。十一月末的一个夜晚，在苏黎士的一个街心公园里，碰上了捷克斯洛伐克“流亡者”为声援国内斗争而举行的烛火集会，听了他们慷慨激昂的演说。十二月初，在科隆的一个研究所听过西德学者对局势大变的乐观估计，当然也看到他们对“资本主义得胜”怀有的那种毫不掩饰的“沾沾窃喜的心情”。十二月上旬的某一天，到了东柏林。那时，柏林墙正在崩塌，一些地段正在被捣毁。在著名的勃兰登堡门东德一侧以“勃兰登堡门”和以“东德”与“西德”分界线的铁栏杆和木板墙为背景，拍了有我在画面上的一张照片。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那一刻我正站在历史的转折点和历史的分界线上！

1983年，我曾怀着极大的好奇心从西柏林一侧看过举世闻名的“柏林墙”。那上面用鲜艳的颜色涂写着因“非法越墙”而被枪杀的东德人的名字。也曾在西柏林一侧的岗楼上遥望过东柏林。无论1983年从西柏林到东柏林，还是1989年从东柏林到西柏林，我和所有过境者一样都经历过东德边防人员的严格盘查。那一切做法好像都为的是让你清晰地意识到：你这是从一个国家“过境”到另一个国家，尽管你同时也知道你跨越的只不过是一个城市里一步就可跨越的一条线。而且说不定此刻你的左脚站在“西德”，而右脚则站在“东德”。谁都知道：“东柏林”和“西柏林”本是一个城市，两边住着讲同一种语言的、有同一“传统”和“风

俗”的同一个民族。然而，从1961年8月13日“柏林墙”矗起到1989年11月的被捣毁，它们之间竟然咫尺天涯，以两个“敌对国家”的身份面对面地对峙了二十八年之久。“一城两国”、“一城两制”的现实，令我们这种小智小慧者实在难以索解。而“西柏林”的繁华和“东柏林”的匮乏，又老是令我们找不到有说服力的理由为之解说。仅仅为了跨越过那一堵“墙”（那墙体有的段落可能只有几厘米“宽”），许多“东德”人竟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

十二月中旬回到莫斯科后，不久就传来了“东柏林”和“西柏林”市民共庆勃兰登堡门（它曾是德国分裂的象征）贯通的消息。而“柏林墙”的石头从此则成了人们不惜花重金购买的收藏品。“柏林墙”无疑是我们这个世纪最奇特和最发人深思的历史现象之一。12月25日传来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被“绞死”的消息，这消息对人们的心灵产生了极大的震撼。东欧的巨变已经完全不完全是流血地进行的了。但巨变却已不是可以靠外力来扼止的了。此时，“匈牙利事件”已得到那个国家人民自己的平反，而“布拉格之春”的性质也已被那个国家的人民自己颠倒过来。在1989年的那个十二月里，用平息“匈牙利事件”和“布拉格之春”的那种方式，来对付此时此地发生的“事件”已被历史判定是不适时宜的了。

我之所以认为“二十世纪”于我是在1989年最后的三个月里结束的，是因为我是把我所研究的对象的存亡做为参照系的。几十年来，我一直把“苏联”和“苏

联哲学”做为我的研究对象。我的这个研究对象有确切的“产生”和“终结”的年月。而它的“产生”和“终结”又和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二十世纪”，不仅息息相关，而且实质上同步。

人们一直认为，俄国 1917 年的十月革命创造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在一定意义上，我们的确可以把 1917 年十月革命看成是“创世纪”的开端。而从这种意义上说，1991 年底苏联的解体则意味着以“苏联”的存在为标志的“世纪”的结束。俄罗斯民族是一个善于“创造历史奇迹”的民族。“二十世纪”之初的 1917 年十月革命和“二十世纪”末的苏联解体，堪称是这个民族开创的两件具有“世纪性”意义的大事。从目前形势看，在本世纪仅剩下的两年里，即使这样一个民族也已回天乏力，不大可能把“苏联”再复兴起来。“苏联世纪”确实已经提前在 1989 年结束了。这样一来，俄罗斯人在本世纪末似乎重又返回到本世纪之初，他们面临的重又是“俄罗斯向何处去”的问题，他们不得不像他们在本世纪之初曾经做过的那样：重做一次“历史选择”。不过我始终认为 1917 年的十月革命和 1991 年底的苏联解体，是我们这个世纪发生的最具有“历史启示意义”的事件。但是，真正弄懂它们带给人类的启示意义，恐怕要到二十一世纪了。

苏联的解体和随之而来的“苏联哲学”的终结，已经成为一个既成的事实。然而我绝对想不到的是：我的研究对象竟然会“消失不见”——最先“消失”的是我所研究的“南斯拉夫当代哲学”，随后“消失”的是我

所研究的“苏联当代哲学”。研究对象“消失”带给研究者的那种苦恼，可以说是我的一种独特感受。在千百个哲学研究者中，有我这种体验的怕是极少。人如果因此而产生失落感，那我的失落感就是双份的。

“苏联哲学”的终结为“二十世纪的哲学”提供了鲜有的，甚至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事例。“苏联哲学”及其终结有这样一些特点：(1) 它是一个有始有终的哲学。与其他哲学不同，苏联哲学的起始和终结，从时间角度来说，十分清楚和明确。它起于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结束于1991年底苏联的解体。(2) 它是一个与政权和国家共存亡的哲学。哲学的产生和存在，存在的时间长短，与某个特定性质的政权和国家的产生和存在，本没有什么直接对应的关系。然而“苏联哲学”却为历史提供了首例：它随着“苏联”的产生而产生，它又随着“苏联”的解体而消亡。(3) 它是一个终结得很是彻底的哲学。只要“苏联”不能原模原样地恢复，“苏联哲学”就不可能再有了。“苏联”即使在形式上得到恢复，从前有过的那种“苏联哲学”也不可能原原本本地再生了。这首先是因为：今天的俄罗斯人和俄罗斯哲学家很难从以往的“苏联哲学”中找到真正值得肯定的、在推动苏联发展方面确实起到过正面而积极作用的、经得起时间和事实检验的理论进展和成果。那种哲学的消失，不会引起人们的惋惜。其次是因为：俄罗斯人现在对哲学是什么及它在社会和人的生活中起什么作用，已经有了全新的看法。多数人已不再认为，一个国家必须要有一种法定的“国家哲学”。哲学家研究和

讲述什么哲学，哲学家站在什么立场上，属于什么党派，已被认为是哲学家个人的事。而更深层的原因则在于，俄罗斯人已经懂得了：与千年的俄罗斯历史和传统相比，七十多年的“苏联时期”只是其中的一瞬（尽管是极为重要的一瞬）。对俄罗斯命运起长久而持续作用的是俄罗斯自身固有的经久不衰的传统。在观察和研究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走向时，也许我们最不应忽视的恰恰就是它的传统。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世人始终对俄苏和苏俄表示了极大的关注。世界哲学界从前关注的是“苏联哲学”的各种动向和趋势。现在最为关切的则是：在“后”苏联，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哲学？！这的确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也是“苏联哲学”在二十世纪终结时留给世人的具有世纪启示意义的课题。

在世界上，关注和研究“苏俄哲学”的人来自三个方面：（1）苏俄哲学家自己；（2）世界社会主义诸国；（3）西方世界。我在自己的研究中，十分注意保持与这三方面有关人士的联系和交往，把他们的研究作为“测度”自己研究水平的参照系，努力把我国人在这一领域里的研究保持在世界的同等水平上。在西方，被视为“苏俄哲学”研究权威的主要是瑞士的 J·M·鲍亨斯基及其弟子们（美国的 T·J·布莱克利，瑞士的 G. Kung，德国的 N·罗波科维茨等）和意大利的 G·维特尔。在中国，也许只有我与他们每个人都有过或多或少的接触和交往。1989 年我在瑞士见到的鲍亨斯基和在意大利见到的维特尔都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前者的